

村寨

茶

雅人

台湾宜兰县武塔村调查

主 编：宋光宇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茶

雅人

台湾宜兰县武塔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 编：宋光宇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雅人：台湾宜兰县武塔村调查/宋光宇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98-0

I. 泰... II. 宋... III. 高山族—居住区—调查报告—宜兰县 IV. K2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5912 号

泰雅人——台湾宜兰县武塔村调查

主 编：宋光宇

责任编辑：纳文汇

责任校对：虞 宏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9.5

插 页：8

字 数：239 千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68-798-0/C·81

定 价：20.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投资。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和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 500 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年5月

序 一

佛光大学校长 赵 宁

佛光大学是一所芳龄四岁的学校，急需要各方善心人士的呵护和关怀，方才得以成长。当人类学系宋光宇主任把这本“泰雅人——南湖大山的子民”的工作报告拿来，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时，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本校和本校的人类学系通过这个机会，得以结识中国大陆上，乃至世界上的同行。“以文会友”的情形下，让各方前辈认识我们。

台湾是一个由不同时期的移民所组成的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先民就从华南各地渡海来到台湾，形成台湾最早的绳纹陶文化，也带入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这就是现在所谓“原住民”的由来。这拨移民持续了很久，在几百年前，更有从南方的菲律宾移入的“达悟人”，住在台东外海的兰屿。台湾本岛南部的鲁凯和排湾两族也跟菲律宾有关系。同属“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

台湾是一个族群关系相当复杂的社会。在原住民方面，有山地和平埔之分。清代称之为“生番”和“熟番”。山地原住民现在分成十二族，已经汉化很深的平埔又分成十族。400年前，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福州，广东的潮州、惠州和嘉应州等地的先民纷纷渡海而来讨生活。这个移民潮持续了300年。后来笼统的分成“闽南人”和“客家人”两个阵营。50

年前，大陆各省的人士又因战乱的关系，大量来到台湾，总数大约有 200 万之多。这拨移民各有各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可是 50 年来，放弃了原来的文化、语言、风俗，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用现在台湾的政治术语来说，统称为“外省人”。这种复杂的族群关系引起一些国际人类学家的兴趣，在十多年前，慢慢地引发 Ethnicity 这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台湾也跟云南一样，是一个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宝地。现在活跃于美国人类学界，年龄在 45 岁以上，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类学家，大都在台湾从事田野调查和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台湾的人类学家也是利用这里丰富的民族资料，在国外名校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

这次武塔村泰雅人的调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向大陆的同行介绍台湾的族群，另一方面也是让本校的师生有一个实地调查的机会。在此，向主办单位表达十二万分感谢之意。

序 二

2003年9月初，应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院长之邀，前去访问讲学。在人类学研究所作了两次演讲，一次是介绍台湾人类学界的概况，一次是讲我目前所主持的生命学研究所究竟在做什么，有什么想法。会后，石奕龙教授就提出一个要求，说是云南大学正在主持一个大型的调查研究计划，要作全国的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独缺台湾方面的资料，显得不够完备。问我是否可以接下这份工作，挑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村寨，做调查记录，让这项工作得以完备。当下我就答应了，一方面这种调查工作是人类学者的天职，一方面也是可以让甫成立一年的佛光大学人类学系可以有机会结识大陆上的同行。

我之所以敢接下这份工作，时间又非常的紧促，三个月里要完成，是因为本校成立以来，一直与地方乡镇有很密切的往来，特别是以原住民为主的大同乡和南澳乡。秘书室的赖清柱兄一直负责这方面的联系工作，也负责替南澳乡公所编纂《南澳乡志》，留下相当可观的田野调查资料。只要花一些时间去整理和补充，就可以圆满完成任务。

回台湾后，就和清柱兄纠集人类学系和生命学所几位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到南澳乡去作田野调查。选择南澳乡武塔村的原因是这个村子交通方便，只需要搭乘火车就可以到达，不需要自行开车。南澳乡在苏花公路上，巨型的砂石车成天成群结队

呼啸而过，对于我们这种开小轿车的人来说，有莫大的危险性，搭乘火车就没有这种顾虑。

不过也有预想不到的麻烦，武塔村居然没有小吃店，更没有餐厅。平时只有老弱妇孺在家，无法应付我们大队人马的餐饮需求，还是需要用轿车把同学载到南澳乡公所附近街上的小吃店用餐。这种景象已不是三十年前我当学生时自行起火煮饭，更不是五十年前李师亦园先生走三天的山路，方能上到山顶的部落可以比拟。

由于工作时间很短，学生又只能在周末去做田野调查，而南澳各村青壮年多半外出工作，村中只留下少数的老弱妇孺，要跟调查对象约定时间就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因此，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是相当有限的。不论如何，能有这么一次实际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对于新入门的学生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这要感谢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和云南大学的张跃教授赐予我们这样的机会。

本书的全部照片均为赖清柱兄亲自拍摄于实地，少部分也由他翻拍自历史照片。

这是本系第一次和大陆的同行合作。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一起为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努力。

明 远 宋光宇 谨 志
2004年2月5日元宵节

导 读

——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些基本认识

宋光宇

一、有关台湾原住民族起源的一些想法

1926年（民国十五年），在当时的北平附近房山县周口店遗址最上面的山顶洞堆积层里面，发现了八具人类的遗骸，头颅和下巴骨都保存了下来。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 1882 - 1949）辨认出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两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两个成年的女性、一个青少年、两个小孩。

魏敦瑞检视三个保存最好的头颅之后，认为有一个是年约六十多岁的男人，属原始蒙古种；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属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人（属于南岛语族群）和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女子，属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如下图所示：



左边蒙古种 中间美拉尼西亚人(南岛民族) 右边爱斯基摩人

图1 山顶洞人头颅化石

如此一来，山顶洞人可说是蒙古种的中国人、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东南亚与太平洋上的南岛民族的共同祖先。山顶洞的年代测定为距今两万年前。换句话说，在两万年前，山顶洞人生存的那个时候，这三个族群还没有开始分化。

大概是爱斯基摩人最早分出去。到了一万年前，华北出现蒙古种人的比例逐渐升高，而南岛民族较多出现在华南，著名的人类化石有在四川发现的“资阳人”，在广西发现的“柳江人”，在云南发现的“丽江人”，都带有南岛民族的体质特征，也都跟华北的蒙古种人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考古学家也发现，六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主人，其体质特征带有南岛民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天东南亚和太平洋上各岛屿的民族，包括台湾的原住民在内，他们的源起可能是在华东地区，以后才因迁徙而慢慢地分衍出来。

大概从六七千年前，或者更早，南岛语系各族群开始向南方、向海洋迁移。经过四千年，这个族群从北至南，从大陆到中南半岛，由半岛到大岛，再往东，散布到太平洋各个小岛，形成一个非常广大的南岛语系分布区。台湾保有南岛语系最古老的形态，语言年代学推测台湾北部的泰雅语、中部的邹语和南部的排湾语、鲁凯语形成的时间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而菲律宾是五千年前、婆罗洲是四千五百年前，马来亚、苏门答腊、马达加斯加是三千二百年前，密克罗尼西亚是三千年前，夏威夷、复活岛是一千五百年前，新西兰是一千二百年前。

学者们推测，在台湾的南岛语各民族至少分成五批迁入台湾，最早来的是泰雅人和邹人，时间大概是六千五百年前。最晚的是兰屿的达悟（雅美）人，五百年前才从菲律宾的巴丹岛迁过来。也就是说，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南岛语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台湾很可能是他们最早移居的地方之一。移进来之后，不再跟外界有太多的接触，以致可以保存最古老的

语言形式。整个南岛民族分布在两万多个岛屿，现今有人口1.71亿。

台湾原住民族一直分为住在平地的平埔族和住在山地的山地族两部分。^①这种分布是从他们移进台湾的时候就形成的，该住高山的族群就进入高山，该住平地的族群就在平地。从来就没有平地的族群“被迫”迁去高山的事，最多只是搬到在山脚下而已。在平地的各族其实也很怕高山的各族，因为像布农、鲁凯、排湾、泰雅各族人都有猎头的习俗。依照高山各族的神话传说，他们的发源地是在更高的高山上。只是囿于装备、人力和经费，台湾的考古学家目前没有能力去发掘传说中的旧址。

二、十三行遗址所透露的讯息

一般学者都认为汉人到台湾的时间是在明朝末年，从那个时候算起，汉人在台湾的时间不过是四百年。直到十三行遗址大规模的开挖，才开始稍稍知道其中的详情。1989年，因为要在这个遗址上兴建八里污水处理厂，才展开大规模的抢救发掘，把整个遗址全部开挖。

十三行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大量的墓葬、陶器、贝类、居室之外，有三项遗物值得注意：

第一，发现有炼铁的场所。虽然台湾西部沿海的原住平埔各族，在汉人尚未大批移住之前，已经使用铁器，但是也只限于“使用”而已，不曾有自己炼铁的记录。十三行遗址首次发现有炼铁的技术，时间测定为一千八百年前，铁砂和煤都是就地取材。

我们知道，东亚的铁器文明起源于华北，秦汉的强盛可说

^① 平埔族、山地族的称谓是台湾现在通行的称呼。

是得力于大量使用铁器。考古学家原先推测，在东汉的时候，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大军征讨在福建浙江的山越，也就是南岛和侗傣语系的民族。把大批山越民族移往内地，把中原的罪犯和军队留在当地。这么一来，铁器文明切断了台湾和福建的南岛民族之间的联系。可是，十三行遗址的炼铁遗址清楚地告诉世人，东汉的铁器文明不仅征服了福建，更渡海来到了台湾，只是不见于史书的记载而已。

第二是钱币。十三行遗址出土了一枚上端钻了小孔的汉代五铢钱，几十枚唐宋时代的钱币。

这些实物至少告诉我们，台湾在唐末五代时已经跟福建沿海有某种程度的来往。唐朝武则天时代，陈元光带领部队移入福建南部，是为汉人正式开拓闽南之始，泉州也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港口。在唐末五代时，蒲寿庚割据泉州，形同独立。宋代，泉州发展成为第一大港口。台湾在这段时间不应该不跟泉州接触。钱币的出现，至少表示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台湾西部的南岛民族已经和福建泉州有某种程度的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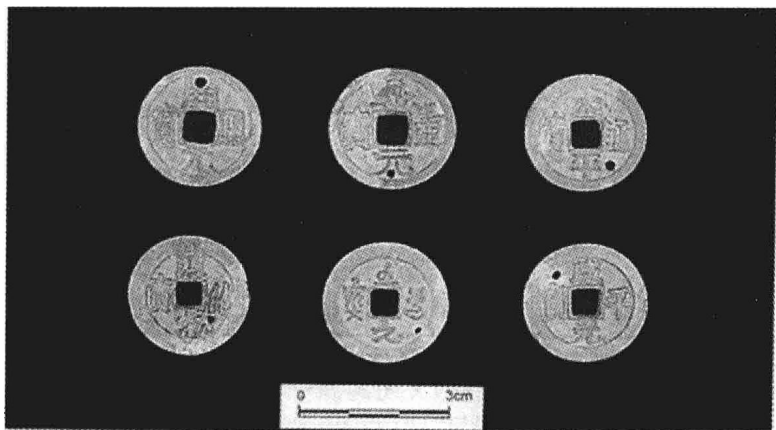


图2 台湾十三行出土的钱币